

# 後帝國之眼與殖民地文化碎片 ——論《南風如歌》中的台灣書寫 與認同流動

楊慧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 中文摘要

本文藉由《南風如歌——一個日本阿嬤的台灣鄉愁》中的台灣書寫來釐清與灣生相關的認同詮釋：第一、灣生的「故鄉台灣」是一個「凝結時空體」，台灣作為灣生故鄉認同的身分元素被調度出場時，其必然是與日本作為國族認同相伴隨的，所指涉的時空意義則僅止於日殖時期，並不向後延展，亦不包含當代台灣。第二、由於戰後社會處境的雷同，在地台灣人與灣生便以作為被壓抑根源的殖民地經驗為依歸，在殖民體制退場後加以懷舊想像與再詮釋，形成了一種溢出國族之外的「跨時空想像共同體」，但此一共同體情感卻十分脆弱，在主體實際遭逢時極易因雙方互動的力場變化而鬆動甚至瓦解，呈現出複雜的面貌與角力的態勢。最後提醒台灣社會不應忽視：灣生選擇台灣為養老的落腳地，某部分的背後促成因素其實是日本政府當代的「游牧享老政策」與帝國擴張時期的「移殖民政策」二者在前殖民地的跨時代相遇。

關鍵詞：灣生、認同流動、台灣書寫、想像共同體、後殖民

**The Post-Empiral Eyes**  
**and the Culture fragments of Colony**  
**——Taiwan writing and Flowing Identity**  
**in 《南風如歌》**

Yang, Hui-li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rying to clarify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identity related to Wansei (Taiwan-born Japanese) by analyzing the writing in the book 《南風如歌——一位日本阿嬤的臺灣鄉愁》. The first perspective: Hometown-Taiwan to Wansei is a” coagulated time-space”--- it based on Japanese Identity and be effective only during Japanese colonization period, not include contemporary Taiwan. The second perspective : Cause of similar social situation in Post-war, some Taiwanese and Wansei found the Imagined Community out of National Identity after colonial period. However, this Imagined Community is very unstable and complicated, it disintegrates easily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nteraction. At last we

could understand that Wansei chose Taiwan as the place for long stay at their old age not only means the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Taiwan but also represent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population policies of different eras having encounters in their former colony, Taiwan, across the times.

**Key words:** Wansei(Taiwan-born Japanese), Flowing Identity, Taiwan writing, Imagined Community, Post-colonialism

# 後帝國之眼\*與殖民地文化碎片\*\*

## ——論《南風如歌》\*\*\*中的 台灣書寫與認同流動

### 1、前言

隨著二戰結束，以弱小民族自決為共識的國際新秩序生成，亞非各個殖民地紛紛獨立，表面上看來殖民帝國主義似乎已然消亡，但另一方面，雖已與舊帝國主義脫鉤，但仍以資本主義邏輯為擴張手段的國際經濟強權卻也迅速成長起來。從戰後這波詭譎的國際局勢，我們可以看到，殖民帝國主義的靈魂換上新裝，陰魂不散的從政治軍事模式轉為／回以商業經濟模式開疆拓土，形成了以經濟發展程度為區辨標準的國際階級——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未開發國家。德、日等名義上的二戰戰敗國依附著這一股經濟趨勢再度迅速崛起，在非常短的時間內，不僅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協助本論文的修改並提供未來重要的思考方向。本文初稿曾宣讀於〈2016「戰後東亞文學與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韓國濟州大學中文系、人文科學研究所主辦，臺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合辦，2016.06.29）。

本論文中「後」帝國之眼的「後」是挪用了「後現代」之於「現代」之間的歷史發展關係——因為是時序上、發展上的後，故而並非斷裂的，而是有承繼，亦有流變。意即，後帝國之眼某一部分是承繼了殖民帝國主義時期的優勢觀看位置，但同時因為歷史的演變，此一觀看位置亦與前一歷史時期產生了某種差異，例如身為殖民帝國的一分子面對殖民地的驕傲與愧疚並存。

\*\* 本文借用李育霖在〈台灣作為方法：重讀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中對於陳光興主張的詮釋：「與其拒斥或焦慮西方問題，不如將其視為自身主體內部構成的碎片，並試圖加以轉化」之論述脈絡與概念。李育霖，《翻譯域境：主體、倫理、美學》（台北：書林出版社，2008年），頁174。

\*\*\* 鈴木怜子著，邱慎譯，《南風如歌——一位日本阿嬤的台灣鄉愁》（台北：蔚藍文化，2014年）。為求行文簡潔順暢，本論文題目及引文標註時僅標示書名主標題。

從戰敗的蕭條荒蕪中站起，更重新成為國際新秩序的上層階級。而始自十九世紀，迄於二戰結束的全球帝國殖民史中，日本在亞洲的殖民擴張是非常重要的。台日至今仍難以理清的歷史文化與民族情感的複雜糾葛亦是肇始於此間五十年的殖民時期。此一複雜的糾葛從近年灣生議題在台灣社會的發酵尤其可見一斑。

2014 年與紀錄片《灣生回家》<sup>1</sup>配套出版的口述歷史《灣生回家》<sup>2</sup>，在出版的當下引起了相當的關注，隨後紀錄片的播出，更是將灣生議題在台灣社會的關注程度帶向一個高峰。剎時間，台灣社會像是「忽然發現」了這個與台灣土地緊密關連的歷史群體的存在<sup>3</sup>。再加上《灣生回家》一書與紀錄片當中都頻頻強調灣生對於台灣思鄉情懷的濃烈，認為台灣才是他們的故鄉云云，更是打動臺灣社會大眾的心，將灣生視為「自己人」，感動於他們對於臺灣的「愛」。正因為出版時引起廣大的注目，以至於後來作者的假身分被拆穿時同樣激起了非常大的社會漣漪<sup>4</sup>。凡此種種的社會反應其實都折射出了日殖時期歷史在戰後的台灣社會長期被國家政策所排除、壓抑的現象——對於長達半世紀的日台殖民史，台灣社會大眾是非常陌生甚至是無知的。一如張素玠在《未竟的殖民——日本在臺移民村》一書中所言：「一般人不認識這段歷史的『真』，也就難以分辨渲染過的『假』」<sup>5</sup>。而對日台殖民史如此長期的排除，同時也使得台灣社會從戰前的殖民統治到戰後日本經濟起飛所形成的多元而複雜日本情結一直未能有面對與釐清的機會，深深的影響了台灣自我圖象的描繪。

台灣從解嚴後的九〇年代開始，尤其是 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後，日治時期史料開始大量的出土，從政治史、經濟史到生活史俱有之，尤其生活史的部分更是非常豐富。灣生相關書籍的出版可說是這一波風潮之下的產物。從竹下

<sup>1</sup> 黃銘正執導，《灣生回家》（台北：田澤文化，2015 年）。

<sup>2</sup> 田中實加，《灣生回家》（台北：遠流出版社，2014 年）。

<sup>3</sup> 雖然 2008 年的電影《海角七號》即已讓台灣社會的日本（殖民）情結浮出表面，灣生也被包含在遣返日人的群體當中重新進入了台灣社會的視野。但筆者認為灣生作為一個獨立的歷史群體在台灣社會公眾領域集體現身、被看見，且引發大量的討論與反應，還是在《灣生回家》紀錄片的上映之後。

<sup>4</sup> 筆者認為田中實加假造灣生身分固然值得譴責，但正因此一假造灣生身分的舉動，更擴增了探討《灣生回家》現象的深度，不僅不該將其僅僅視為一假造的文本而加以譴責，更應該進一步的去探討作者假造身分的動機、以及頂著灣生後代的身分所能引起的關注等等背後所隱含的台灣社會的「日本症候群」的歷史意義。

<sup>5</sup> 張素玠，《未竟的殖民：日本在臺移民村》（新北：衛城出版社：2017 年），頁 11。

信子的《日治台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明治篇 1895-1911)》<sup>6</sup>、《灣生風土·立石鐵臣》<sup>7</sup>、《流轉家族：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sup>8</sup>到備受爭議的《灣生回家》口述歷史與記錄片，以及本論文主要討論的核心文本——《南風如歌：一位日本阿嬤的台灣鄉愁》<sup>9</sup>。這一系列與灣生相關史料、論著的出土、出版，其實皆可視之為台灣重新挖掘戰後因為政權轉移而被壓抑的（殖民）過去，是奠基於想要描繪更完整的自我圖象之欲望。而自我總是透過他者的存在而顯現，且自我與重要他者的界線也總是一種動態性的曲線。於是，日殖時期的台灣文化研究通常存在著兩種觀點——第一種是強調關係的起源，視日本為相對於台灣的侵略性他者，而稱之為日據時代；第二種則著重於歷史性的過程與結果，視其為已內在於台灣的一部分，稱之為日治時期。而此兩種觀點的選擇關乎我們有著如何的台灣主體想像，甚至是欲望著怎麼樣的一種台灣主體圖象。然而選擇前者或後者的困難，其實是台灣或者說是每一個殖民地自我表述的難題：在活生生的歷史進程中殖民地無可選擇的與殖民者已然「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形成了互為文化碎片的存在。故本論文在此捨棄了歷來在日據與日治當中二選一的抉擇，採取了較為中性的指稱——日殖時期。因為無論是占據或治理，都是奠基於殖民的事實方得以存在的。而本文所要處理的核心主題——灣生，正是此一歷史現象的最佳實存（產物）與表徵。

在台灣，以灣生為題的學術研究大致是在近十年間興起的。早期，灣生一直被放在「在台日人」這個身分框架下討論，觸及的多為政治、經濟議題，例如：以日本移民村為研究對象而觸及灣生議題的有林呈蓉：〈日本的台灣經驗——日治時期的移民村〉<sup>10</sup>與張素玠於 1998 年完成，2001 年出版的博士論文：《台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9-1945）——以官營移民為中心》<sup>11</sup>；其後才漸漸

<sup>6</sup> 竹中信子著；蔡龍保譯，《日治台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明治篇 1895-1911)》(台北：時報文化，2007年)。

<sup>7</sup> 邱函妮，《灣生風土·立石鐵臣》(台北：雄獅出版社，2004年)。

<sup>8</sup> 下山一(林光明)自述，下山操子(林香蘭)譯寫，《流轉家族：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台北：遠流出版社，2011年)。

<sup>9</sup> 同註\*\*\*。

<sup>10</sup> 林呈蓉，〈日本的台灣經驗——日治時期的移民村〉，收於戴寶村編，《台灣歷史的鏡與窗》(台北：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2012年)，頁 136-145。

<sup>11</sup> 張素玠，《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9-1945）：以官營移民為中心》(台北：國立政治大

有關涉身分認同，以「故鄉意識」為題的研究出現，如：顏杏如的〈流轉的故鄉之影——殖民地經驗下載台日人的故鄉意識、建構與轉折〉<sup>12</sup>聚焦於灣生日本人引揚後產生「台灣故鄉意識」的社會背景、歷史處境與心理狀態；林初梅的〈灣生日本人同窗會及其台灣母校——日本引揚者故鄉意識與台灣人意識所交織的學校記憶〉<sup>13</sup>則是以戰後台灣各級學校與日本校友的往來、校史書寫的變遷等，指出台灣當代的日本記憶有一部分是在戰後與灣生日本人共同建構出來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篇論文當中灣生一詞的譯介仍是存有歧義的——顏杏如的〈流轉的故鄉之影——殖民地經驗下載台日人的故鄉意識、建構與轉折〉一文中是採用「在台日人二世／三世」與「灣生」這兩個名詞來交替使用；林初梅的〈灣生日本人同窗會及其台灣母校——日本引揚者故鄉意識與台灣人意識所交織的學校記憶〉所謂的灣生日本人則是包含了「出生於日本的第一代在台日人」<sup>14</sup>。而近幾年台文學界的研究算是將灣生這個身分較明確的從在台日人的框架中獨立出來，其中對於灣生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以歷史文本中的「實際灣生」為對象，以及以文學文本中的「灣生角色」為對象兩類。前者最具代表性的有成大鳳氣至純平的碩士論文：《中山侑研究——分析他的「灣生」身分及其文化活動》<sup>15</sup>及博士論文：《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的台灣歷史像》<sup>16</sup>，單篇論文有林慧君〈新垣宏一小說中的台灣人形象〉<sup>17</sup>。後者則有林慧君〈日據時期在臺日人小說中灣生的認同歷程〉<sup>18</sup>、曾秀萍〈一則弔詭的台灣寓言——《風前塵埃》

---

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

<sup>12</sup> 顏杏如，〈流轉的故鄉之影：殖民地經驗下載台日人的故鄉意識、建構與轉折〉，若林正文、松永正義、薛化元主編，《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論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8年），頁173-217。

<sup>13</sup> 林初梅，〈灣生日本人同窗會及其台灣母校——日本引揚者故鄉意識與台灣人意識所交織的學校記憶〉，所澤潤、林初梅主編，林初梅監譯，《戰後台灣的日本記憶》（臺北：允晨文化，2017年），頁307-359。

<sup>14</sup> 此處是針對上述兩篇於台灣發表的論文而言，並非意指灣生一詞在台、日史學界的定義皆是模糊的。

<sup>15</sup> 鳳氣至純平，《中山侑研究——分析他的灣生身分及其文化活動》（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sup>16</sup> 鳳氣至純平，《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的台灣歷史像》（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年）。

<sup>17</sup> 林慧君，〈新垣宏一小說中的台灣人形象〉，《臺灣文學學報》第16期（2010年6月），頁85-111。

<sup>18</sup> 林慧君，〈日據時期在臺日人小說中灣生的認同歷程〉，《國文天地》25卷3期（2009年

的灣生書寫、敘事策略與日本情結》<sup>19</sup>、〈灣生·怪胎·國族－《惑鄉之人》的男男情欲與台日情結》<sup>20</sup>。上述以歷史文本中的實際灣生為研究對象者，多旨在探索日治時期的灣生日本人對於殖民地台灣所懷抱的情感與認同的狀態與第一代在台日人的差異，析論其中所透顯的台日史觀。而以文學文本中的灣生角色為研究對象的三篇論文雖然論述細節各有不同，但大致上是以小說中灣生角色的認同象徵與殖民關係想像為焦點——〈日據時期在臺日人小說中灣生的認同歷程〉一文中，林慧君藉由文本內外的灣生創作者與灣生角色間的兩相對照以評述灣生對於殖民地台灣認同位置的轉變；而曾秀萍的兩篇論文則是透過戰後台灣小說中的灣生角色來論述其中所隱含的台日之間的殖民與後殖民關係的想像。本文即試圖延續上述第一類以實際灣生為對象的前行研究，選擇從《南風如歌——一位日本阿嬤的臺灣鄉愁》這本由灣生親自執筆<sup>21</sup>的回憶錄入手，嘗試梳理其中的台灣書寫，企圖釐清台灣社會面對灣生時總聲稱「非常感動於他們對於這塊土地的感情與認同」中，所謂的灣生的「思鄉之情」，甚至是台灣社會喜歡聲稱的「灣生的台灣認同」究竟奠基在甚麼樣的基礎之上，實質的時空內涵又指涉了甚麼？與此相對應的台灣社會所展現出來的灣生熱潮，甚至是「台灣的灣生認同」又涵涉了甚麼樣的社會集體情結？雙方的互動又表述了甚麼樣的文化身分，展現了甚麼樣的後殖民歷史圖象？

關於身分認同 (identity)，本文將借用美國學者蘇珊·斯坦福·弗里德曼 (Susan Stanford Friedman) 在〈超越女作家批評和女性文學〉一文中所論述的社會身分疆界說 (the geographies of identity) 來析論《南風如歌——一位日本阿嬤的臺灣鄉愁》一書中的認同圖象。弗里德曼的社會身分疆界說最主要的

---

8月)，頁56-61。

<sup>19</sup> 曾秀萍，〈一則弔詭的台灣寓言－《風前塵埃》的灣生書寫、敘事策略與日本情結〉，《台灣文學學報》第26期（2015年6月），頁153-189。

<sup>20</sup> 曾秀萍，〈灣生·怪胎·國族－《惑鄉之人》的男男情欲與台日情結〉，《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24期（2017年4月），頁111-143。

<sup>21</sup> 上述有關灣生的著作當中，下山一（林光明）自述，下山操子（林香蘭）譯寫的《流轉家族：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雖然與鈴木伶子的《南風如歌——一位日本阿嬤的臺灣鄉愁》皆算是嚴格定義上的回憶錄，但前者是日本警察與台灣原住民結合而產下的台日混血灣生，其所涵攝的歷史／文化身分的社會脈絡已大大的溢出台灣社會的日本情結之外，且其中涉及台灣原住民戰前戰後的社會／歷史處境，實為一更複雜的議題範疇，須另文討論。



論點在於打破了強調單一認同的取向，提出了交織共構的觀點。她指出每個人的身分認同其實是多重交織的，在性別、種族、階級、信仰等面向中，每個人都同時擁有不同的身分元素，而這些身分元素更是動態的存在，不同的元素會隨著主體的處境而出場或退場、強化或淡化。在弗里德曼的理論中，因為構成主體身分認同的元素是多重且動態的，會隨著主體所處情境而變化的，所以從此一情境流動至彼一情境時，可能性別元素被突顯了，其他元素則退居在後；又流動至另一情境時，則可能種族被強調了，其他元素則變為次要等等<sup>22</sup>。不同於以往的單向的、固定的認同理論，弗里曼關照到了存在於人活生生的處境中的，流動的、調度的認同。在特定的情境中，某些認同元素出場、突顯了，但某些退居在後的元素並不是在身分文本中消失了，而只是暫時「被隱蔽」、「不被調度出場」，但仍然會隨著境遇的改變而流動，伺機而出。本文試圖透過這個理論視角去檢視台灣作為身分認同的元素在《南風如歌》一書當中是如何被書寫？何時被調度出場？何時被擱置／隱蔽／取代？出場時又是與哪些元素共構成主體的文化身分圖象？被擱置時與被調度出場的元素是斷然分裂呢，還是隱隱形成了某種特殊的張力？藉此來釐清前文所提問的：灣生的「思鄉之情」與台灣認同中實質的時空內涵指涉了甚麼？與此相對應的台灣社會所展現出來的「灣生熱潮」，甚至是「台灣的灣生認同」透顯出甚麼樣的社會集體情結？展現了甚麼樣的後殖民歷史圖象？

## 二、帝國 VS. 後帝國

### (一) 故鄉台灣是祖國日本的一部分

當時的我並沒能體會到自己就是居住在殖民地裡。即便旁邊的人講的日語有鄉音，而且習慣也不同，但他們大半是農民、小店商人或工人，所以我總認為那是職業及階級地位不同所致，完全沒能意識到統治者與被

<sup>22</sup> 蘇珊·斯坦福·弗里德曼著，〈超越女作家批評和女性文學批評〉，王政、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頁423-460。

統治者的關係。反而認為大家都是日本人，只是來自不同地區而已<sup>23</sup>。

父母也從來沒有提及任何有關殖民地的事情。<sup>24</sup>

《南風如歌》的主要內容分成三部分：第一章〈在多變的歷史夾縫中〉、第二章〈再訪台灣〉、第三章〈真想定居台灣〉以及算是長跋的終章〈蘊育成長的祖國臺灣〉。其中第一章從父親自上海移動到台灣，進而定居於此開始寫起，至〈撤退返國〉為止，內容聚焦於在台灣度過的童年時光。在此章當中，作者著墨較多的是童年時期的家庭生活，以及在這段時間中遇到的「台灣人」。

一如導讀者洪郁如教授所言，《南風如歌》的特殊處之一在於：它是兩代在台日人的複數記憶之集結與對話，因為這本書的部分日殖台灣是鈴木怜子追隨著父親留下的小冊子，填補著自己所不知道的部分，而描繪的記憶中的故鄉。而家庭生活又是第一章的書寫重心，故而怜子的父親在第一章當中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故鄉台灣」的意義之所以產生，完全立基於父親「因公派駐台灣，並抱著埋骨於此的決心，拼命奮鬥」此一關鍵事實。且在傳統父權社會中，一個家庭的男主人其個人工作收入往往是維持一整個家庭物質生活的重要來源，其社會位階更代表了一整個家庭的社會階級。因為身負提供家庭生存的物質條件與定位家庭階級的重任，一家之主也往往主導著一個家庭所遵循的文化模式與價值觀，其文化認同常常深刻的影響著家庭成員。而怜子在回憶錄的開頭是這麼介紹父親的：「已故家父中島道一生於一八九二年（明治二十五年）的日本東京麴町。祖父中島惟一長期服侍熊本藩各代藩主，後來官拜海軍少校兼海軍裁判長，致力於明治維新。」（《南風如歌》，頁 28）在寥寥數十字極為簡短的篇幅中，怜子將父親的生平連接到上一代的祖父。在她短短的陳述中，祖父的身分是長期服侍藩主的屬臣、致力於明治維新的海軍軍官。透過這兩個身分，怜子筆下呈現出的是一個「忠君愛國」的男性形象。而書中的怜子父親確實也繼承了此一形象——每天早上總是吩咐家人及僕人們分別排在他後方，朝向太平洋彼方的皇宮方向，對著懸掛在鴨居上方土色牆壁的御真影擊掌默拜。且因為

<sup>23</sup> 粗黑放大為筆者所加。

<sup>24</sup> 鈴木怜子著，邱慎譯，《南風如歌——一位日本阿嬤的台灣鄉愁》，頁 20。

對於天皇的崇敬，平日十分拘謹、守禮節的父親還曾因為年幼的作者不小心說出「皇后陛下是歪鼻子」的失禮之語而當場額頭冒青筋、拿起掃把，顧不得穿鞋的追著作者跑（《南風如歌》，頁 41-42）。如此崇拜著天皇之國的父親，其日本皇民的認同自然是十分堅定的，國族身分界線是十分清楚、毫不含糊的。然而，生活在日本皇民認同如此堅定的家庭中，女兒怜子對於自己身在殖民地一事卻渾然不覺，必然是一家之主的父親刻意為之。從怜子的敘述中可以得知，怜子父親（母親）從來不提及任何有關殖民地的事情，以致於讓女兒沒能體會自己就居住在殖民地之中，還認為操著台灣腔日語的台灣人只是來自不同地區的日本人。也就是說，一直到日本戰敗遣返之前，怜子都認為自己是生活在日本國土之內的，並非身處異國。造成這種種無殖民地認知的根本原因，其實是忠貞愛國的中島道一戮力實踐彼時日本政府的治台政策所致——關於日本政府彼時的治台政策大致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著眼於政治經濟的「人口政策」，一是基於家族國家之國體論的「同化政策」。在人口政策的部分，根據日殖時期移民村的相關研究，以及顏杏如的〈流轉的故鄉——殖民地經驗下在台日人的故鄉意識、建構與轉折〉可以得知，第一代在台日人（也就是怜子父親這個世代）基本上受到日本政府為解決人口問題以及開發並經營殖民地而提倡的「遠征精神」所鼓舞，從帝國內部向外部移動，於邊陲的新領地台灣實踐「在他鄉創造故鄉」的官方言論。也就是說第一代在台日人的永住（台灣）是在明治以來日本人口解決方策，獎勵移民的脈絡下所展開的<sup>25</sup>。具體的獎勵辦法，我們在《南風如歌》當中亦可窺得一、二，例如外派至台灣公學校教學的薪資比日本國內多上六成，在台灣還有各種津貼等等。（《南風如歌》，頁 81）除了實質政策的脈絡，治台政策的另一項重點是以「文化換血」的方式，將殖民地台灣納入日本的家族國體論中的「同化政策」——伊澤修二為了將台灣新住民納入為打造單一民族國家的神話所創造出來的「日本國體」中，其所提出的「只要服從，就是天皇臣民」的立場亦為涵養「故鄉在台灣」的觀念提供了理論上的

<sup>25</sup> 顏杏如，〈流轉的故鄉之影：殖民地經驗下在台日人的故鄉意識、建構與轉折〉，收於若林正文、松永正義、薛化元主編，《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論集》（台北：稻鄉出版，2008年），頁 176-178。

精神支持<sup>26</sup>，以一種家族國家論的邏輯，貫穿「父母—故鄉—國家」的關係。根據周婉窈〈時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第三期「國語」教科書的分析〉，日治時期鄉土教育的根本假設，一言以蔽之便是「愛鄉即能愛國」。鄉土教育的終極目標是在塑造以日本為對象的國家認同。為避免在培養殖民地人民對自己鄉土的感情的同時召喚出舊民族情感，因此日治時期的鄉土教育中的台灣是被去除過去的，沒有歷史的鄉土<sup>27</sup>。唯其如此，方能重塑殖民地人民的國家認同，作為新附地的台灣亦方能順理成章的被置入移民政策的「父母—故鄉—國家」的三元連帶中。也就是說對於灣生而言，他們所念念不忘的台灣得放置於日殖時期打造新故鄉的政策歷史脈絡下觀之——在日本政府由上而下力推打造台灣為（新）故鄉的氛圍中，日殖時期的台灣社會「以血統為階級劃分依據」的殖民體質雖是無庸置疑的，但對於位處統治階級的在台日人而言，彼時的台灣／台灣人同為日本這個「家族國家」的一分子，縱有階級之別，但在國家認同的意義上，仍是「一體」的。循此脈絡看來，怜子父親「從來不提任何有關殖民地的事情」實是站在實踐國家政策的立場，將台灣這塊新領地當作祖國日本的一部分、家族國家的新成員視之，故鄉台灣是祖國日本的一部分，在國族認同上並未違背原生的日本認同，甚至可說是由強烈的忠君愛國之心而催生的力行國家政策之舉。其內心對於台灣這塊原本的他者之地的認知是清楚的，並選擇了站在殖民者位置取消台灣的主體性，以便澈底納為己有。故而可見，作為子女的童年怜子在以父為尊的家庭以及（第一／二代在台日人）父親輩所「創造」出來的故鄉台灣中成長，其自然沒能體會到自己就是居住在殖民地裡。這樣的不自覺並非因為真的融入了殖民地的文化、生活中自然而然的隨著時日消弭了台日界線，而是一種刻意為之的政策實踐所使然。

誠如前文所言，像怜子父親這樣的第一代在台日人即便一開始都抱著埋骨台灣的決心，但這樣的故鄉認同是有其政治條件的——故鄉台灣是祖國日本的一部分。對於第一／二代具有祖國經驗的日人而言，他們清楚明白，故鄉台灣

<sup>26</sup> 參考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台北：麥田出版社，2013年），頁69-104。

<sup>27</sup> 周婉窈，〈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第三期「國語」教科書的分析〉《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2年），頁266-271。

是他們實踐國家政策的創造物。所以引揚船上，怜子父親看著發現遠端日本島而歡呼的男子時，內心生出如下的獨白：「離開了故鄉，為何歡呼？」其中所包含的無奈、感慨，除了被迫離開生活了數十年的地方所產生的不捨之外，更有著失去親手打造的故鄉之不甘，而此一不甘亦是日本政府因戰敗而失去殖民地的映照。

## （二）時空凝結的地方感

與第一／二代有祖國經驗的在台日人不同，並未參與接收殖民地的過程，而誕生、成長於父祖輩與日本政府聯手創造的「故鄉台灣」中的灣生日人，自然理所當然的視殖民地為與生俱來的故鄉，這也是許多灣生的台灣情感甚至是認同的根源。而另一方面，其對於台灣的情感與認同也未能擺脫殖民地情境。顏杏如的研究中也提到：

（灣生）即便是親訪台灣，故鄉的身影也都是停留在過去的時間與空間之中……而同窗會的會報中，無論是對「過去」或是「現在」的描述，點點滴滴都在追尋記憶深處孩提時代的身影——建築、事件、動植物、聲音色彩。……亦即，面對已成異邦的台灣時，依然在後殖民空間中尋找過去的空間與足跡，故鄉的身影不隨物換星移，而是留存在文字與記憶中。<sup>28</sup>

在許多對於台灣的情感與興趣都仍不脫殖民時期的灣生當中，鈴木怜子是難得具有「後帝國之眼」的。怜子站在日本帝國解體後的當代來寫這本回憶錄，書中在在透顯出她對於台灣情感以及觀看位置的轉變，這一點從《南風如歌》對於台灣指稱的變化，我們可以發現——當怜子的身分因政治局勢丕變而轉變為「留用日人」後，其在書中對於台灣的指稱也隨之轉變為「台灣省」。（《南風如歌》，頁 65）在〈再訪台灣以及阿里山的回憶〉中也寫道：這個曾經是故鄉<sup>29</sup>的

<sup>28</sup> 同註 25，頁 215。

<sup>29</sup> 底線為筆者所加。

地方，日新月異，令人眼花撩亂。（《南風如歌》，頁 204）其敘事當中也常出現「已成為異國的台灣」、甚至在終章出現——「對雙親或我而言，（現在的）<sup>30</sup>台灣是既無血緣也無地緣關係的國家，而我卻在該地健康而快樂的成長，直到小學畢業。」（《南風如歌》，頁 204）等等，非常具有時空差異意識的陳述<sup>31</sup>。而這些指涉著台灣歷史流變的不同指稱，也清楚的區分出殖民地台灣與戰後台灣對於鈴木怜子而言的差異——雖然是同一塊土地，但因為政權的轉移，台灣作為故鄉空間的意義亦隨之流轉了。遣返歸國後，再度回到這片土地已非「返鄉」，而是「探訪」了。

從具有後帝國歷史意識與視野的《南風如歌》當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當二戰結束，作為戰敗國的日本政府自台灣撤離時，在台日人所認知的故鄉台灣已凝結在引揚歸日的那一刻，由於他們的殖民地空間實踐已經結束，所以關於台灣的「故鄉空間」意義也隨著殖民地時間的終結而不再延展。循此脈絡觀之，《南風如歌》的日文版原書名（以及終章的篇名）：《蘊育成長的祖國台灣——給女兒們的禮物》中的「祖國台灣」意在標誌出時間性——這本回憶錄的「書寫起點」，是記憶中童年成長時期「尚屬於祖國時的台灣」，是日殖時期日本政府的家族國家論邏輯所貫穿「父母—故鄉—國家」的連結關係中的台灣。而做為一種線性家國歷史的連結，台灣必然是被固定的殖民時空所圈限的，唯其如此，「父母—故鄉—國家」的連結關係方能被確認，一旦台灣從這個線性連結中脫鉤，那麼作為日人故鄉的意義也就不復存在了。也就是說灣生的「故鄉台灣」非常清楚的是「日殖台灣」而非當代台灣，是第一代在台日人在「異鄉」所創造出來的「故鄉」，是屬於天皇領土的台灣，是祖國日本的一部分。故而，我們可以說，屬於灣生的故鄉台灣是一個停滯在日殖時期歷史點上的「凝結時空體」，台灣作為故鄉認同的身分元素被調度出場時，其必然是與日本作為國族認同相伴隨的，而所指涉的時空意義則僅止於日殖時期，並不向後延展。

<sup>30</sup> 括弧及其的中文字為筆者所加。

<sup>31</sup> 遣返日人對於「台灣已成異國」的認知，有不同的時間差。顏杏如的研究當中，甚至有遣返七年後才猛然驚覺「台灣是外國」。但或早或晚，已歸國的日人終究會在實際生活中意識到故鄉空間在戰後已成為異國的史實。

### 三、殖民地歷史經驗的召喚

#### (一) 戰爭恥辱感的集體轉嫁

回國後，我家的生活環境就掉到谷底。雖說在台灣受到呵護成長的我，對戰後廢墟的殘狀，以及在那種環境居住的人們之行為舉止等，也有些許概念。但卻沒想到現實的殘酷仍然遠遠超過我的理解範圍。井底之蛙需要張大眼睛看清這個世界，至於其他記憶，就輕輕地收藏在內心之井底吧。（《南風如歌》，頁 71）

正如前文所言，移居並永住台灣是日殖政府為紓解人口壓力、經營殖民地的重點政策。「內地日人」隨著殖民帝國的膨脹、延伸成了「在台日人」，而在台日人於戰後又隨著帝國解體成了「遣返日人」。原本為紓解社會、空間壓力被鼓勵外移的人口被迫從帝國的外部空間收回，突然之間大量歸返的人口被「摺疊壓縮」<sup>32</sup>在日本本土空間，就此產生了諸多的「皺褶與矛盾」<sup>33</sup>。遣返日人們便在如此的皺褶與矛盾中面對並調整著自身的生活與認同。所以歸國後的經歷在多數灣生回憶當中是非常不堪回首的一段，而這一段遣返後的生活，在《南風如歌》當中，作者鈴木怜子僅以〈歸國以後〉這一小節共六頁的篇幅來交代。其中多為家庭生活裡與父母親的互動，對於青少年來說的社會生活重心——六年的學校生活，怜子只是輕輕帶過——

我始終無法融入日本的社會，身心狀態彷彿被卡住的齒輪般的動彈不得。初、高中六年的學校生活，尤其是越到後半段，幾乎沒有任何記憶。校園的模樣？學校大樓有幾層？我都不記得了。高中三年，甚至和週遭環境完全脫離，記憶全是一片空白。（《南風如歌》，頁 79）

接著便述及常因不舒服躲到保健室，而一度被診斷患有梅尼爾氏症，家庭醫師建議換個環境就會好轉，因此高中畢業後父母便想辦法讓她赴美留學了。

<sup>32</sup> 借用顏杏如於〈流轉的故鄉之影〉中的用語。

<sup>33</sup> 同註 32。

這一頁回憶錄中的社會生活空白，其實更深刻的構成了自我與社會的無聲對話，甚至成為某種生命／時代隱喻。如果說一本書的書寫與出版代表的是個人在公領域的發聲，那麼作者選擇不說、不寫的留白，代表的即是在公領域中隱去這段生命史。從這個角度看，那麼這段空白反而弔詭的與個體在公領域的歷史處境有了對應與對話——「戰後，日本社會的殖民地記憶因為種種主流社會需求逐漸被封印，遣返日人的殖民地經驗被迫退出了大歷史的場域，轉入了家庭或類似同鄉會的圈內人組織，成為了一種有限流通於私領域的小歷史」。（《南風如歌》，頁 14）

《南風如歌》中對於引揚抵日的那一刻，有這樣的一小段描述：「當船抵達佐世保港後，除蟲的 DDT 從我們頭上噴灑下來。當我將手上的白粉拍下的同時，偷瞄了母親一眼，她的領口被拉開，DDT 的粉末就直接灑落在她的背裡。」（《南風如歌》，頁 70）下船的那一刻，從頭上噴下來的殺蟲劑 DDT 是個序幕，自此而後，遣返日人便承受著日本社會對於殖民地的歧視與戰敗恥辱感的轉嫁。引揚歸國的遣返日人，尤其是灣生們，其殖民地印記成為底層階級的標誌，所以歸國後在公領域中選擇隱瞞自己的出身是為數眾多的灣生們為求生存的共同選擇<sup>34</sup>。由此觀之，這段在回憶錄中缺席的人生時光，亦是伶子迫於生存需求，而將殖民地故鄉台灣從她現實生活中抹去的時光。甚至可說，在現實生活與公領域中被迫選擇與戰時故鄉台灣的斷裂也造就了伶子這一頁生命的空白。這段回憶錄／生命史的空白不僅對應著戰後遣返日人在日本社會的處境，甚至也折射出戰後國民政府帶著大批政治移民湧入台灣，強烈擠壓了戰後在地台灣人的生存空間，並在「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政策綱領之下與遣返日人一樣有著殖民地經驗的台灣人在此一歷史時期被奪取公領域話語權的社會處境。

回顧二戰歷史，戰爭末期由於美國的加入，使得戰爭局勢有了相當大的轉變，原本早已疲敝、顯露敗象的國民政府因美軍的參戰扭轉了劣勢。換言之，二戰的勝利憑的不是中國本身的實力，而是「美援」<sup>35</sup>。且戰爭過程中所受到蹂躪

<sup>34</sup> 詳參鳳氣至純平，《中山侑研究—分析他的「灣生」身分及其文化活動》（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6年），頁 15。

<sup>35</sup> 此處的「美援」僅取字面的意義，而非特指冷戰時期美國對台的經濟援助。



與侵害更是已積累成深刻的心理創傷，因此在美國兩顆原子彈的威勢下宣告結束的二戰亞洲戰線對於中國而言，是一場「雖勝猶辱」的戰事，加上對日戰爭期間的種種國仇家恨更非空有戰勝之名所能撫平抹滅的。因此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時，對於這塊擁有長達半世紀殖民史的皇民之地無可避免的產生了種種因八年戰爭經驗而來的想像與恐懼，而這些想像與恐懼更具體的展現在戰後的治台政策上——從殖民地經驗汙名化／罪名化邏輯下的台灣人奴化論、公共空間再造的街道名稱全盤秋海棠化並拆掉所有日文店招、到雷厲風行的國語（北京話）運動的官方語言換置等等<sup>36</sup>，無不力圖在公領域當中一一塗銷曾經在台灣社會空間以及台灣人生命經驗中真實存在的日殖痕跡。綜言之，就是以殖民地經驗為汙名／罪名而剝奪台灣人的公共話語權，讓台灣人的日殖生命史在戰後被迫撤出公領域，退守至私領域甚至噤聲不語。以上種種境遇與遣返日人於戰後日本社會的處境若合符節——作為曾生活在戰時殖民地的台灣人與遣返日人回歸母國的懷抱後，不僅未獲得原屬母國的歡迎與照顧，還成為了二戰的替罪羊，承受著統治階層、總體社會因為戰爭而產生的社會空間壓力、民族創傷與恥辱感。在此我們可以看見無論是跨越空間返回祖國日本的遣返日人，亦或是於在地空間迎接前來接收的母國統治者的在地台灣人，隨著戰爭結束而來的都是更加嚴峻的政治情勢。前者被主流社會往下層擠壓；後者則是連好不容易爭取到的不完整參政權都再度被收回。凡此，回歸母國後，殖民地經驗而形成的文化差異因為被汙名化／罪名化而更加突顯出來，不容漠視。因為這些隨著殖民地印記而來的實質排除與剝奪使得無論是遣返日人還是在地台灣人都愈發無可迴避的意識到，無論對於母國的認同意願如何，自己身上的殖民地文化碎片仍然區隔並阻擾著認同的實踐。

## （二）不穩定的跨時空想像共同體

認同的形成除了主體的主觀意識之外，其所處的「關係網絡」亦是重要的關鍵。戰後遣返日人與在地台灣人在各自的母國社會中，種族血統的同一性作

<sup>36</sup> 詳參陳翠蓮，〈去殖民與再殖民的對抗：以一九四六年「臺人奴化」論戰為焦點〉，《台灣史研究》9卷2期（2002年12月），頁145-201。

為認同元素的有效性被強制取消或漠視，取而代之的是「殖民地印記」作為差異性要素卻被強化突顯，並據以畫出差異界線，將具有殖民地印記者推至界線的彼端，界定成異己。故而在此戰後的特殊社會處境中，部份遣返日人與部分在地台灣人「不約而同」、「化被動為主動」的將「殖民地台灣」視為身分認同的元素。同時，因為此時殖民體制已退場，彼此間因殖民體制而來的權力不平等亦隨之於現實中消失，在如此的情境下，原本在殖民體制下分屬於不同利益階級的兩造，因為現實的利益衝突與不平等處境已不復存在，剩下了被選擇性記憶「再想像與再詮釋」的過去，而產生了「逸出國族認同之外」的「跨時空想像共同體」。也就是說，隨著歷史的流轉，原本殖民時期在台灣佔居上層階級的在台日人，隨著戰後的政治情勢成為遣返日人，而與戰後在地台灣人在日、台官方主流的文化場域中同樣被擠壓、被剝奪，於是，部分遣返日人與部分戰後在地台灣人面對認同轉化課題時，便以作為被壓抑根源的殖民地經驗為介質（通常又以日語為表徵），產生了某種「跨時空想像共同體」<sup>37</sup>，在彼此相遇時，「殖民地台灣」作為身分認同的元素便被調度出來，召喚出共同體的情感，相互應和。但值得注意的是，此一跨時空想像共同體是僅存在於台日間的國族階級退場之時，例如，殖民史的各自表述。一旦落實於現實互動時，台日間的國族階級關係便容易在主體的實際互動中浮現，此時因為殖民體制退場所形成的共同體想像以及所召喚的情感便隨之岌岌可危，雙方又將各自歸隊於自己當下的國族認同，就定位於文化／國族階級角力態勢中對立的兩端。此一共同體情感的不穩定性在《南風如歌》一書中有一段非常傳神的描述——老年怜子造訪兆如安養機構時，原本與日語世代婦人們相談甚歡，但當怜子對於台灣人邊站著吃邊找位子的行為表示不妥當時，其中一位台灣婦人即臉色一變的說：「日本不是也有立食嗎？這不都一樣嗎？」（《南風如歌》，頁 183）來護衛貌似被貶抑的台灣文化。而面對此一狀況，怜子隨即以自己也有過類似的經驗等話語來打圓場，方將對方的情緒緩和下來。但對於此一狀況，作者的詮釋是：「那瞬間，

<sup>37</sup> 本文在此以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之定義為基礎，作了延伸義。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2016年）。

我順利的通過這位老婦人對日本懷舊、自負和警戒交織而成的心魔。」(《南風如歌》，頁 184)

在這一段描述中，所呈現出的台日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雙方在後殖民時空遭逢時，雙方文化身分立場的複雜——一方面因為共享過殖民地時空而感到親近，但在這裡曾經的被殖民者與曾經的殖民者仍是透過殖民者的語言方得以溝通，能夠喚起共感的仍是殖民者的文化——身穿粉紅色的麻質洋裝，或是用熨斗燙得很整齊的襯衫。殖民文化的優位性並沒有隨時間而消失，所以一旦與殖民者文化有所差異的被殖民者文化出場時，雙方的文化位階便成了易被挑動的敏感神經，從而形成了攻擊與防守的對立位置。當此一態勢形成時，身為曾經的殖民階級的伶子雖然選擇退讓而化解了緊張的氣氛，但從她的詮釋中也透顯出其站高處，自居理性、客觀的分析姿態，並隱然有批評台灣婦人過度敏感自卑之意。此一複雜的情緒糾葛，讓我們看到台日雙方在戰後「主體實際遭逢」<sup>38</sup>時所呈現出比紙上論述更為動態、複雜的認同流動與角力<sup>39</sup>。

綜言之，在台日主體實際遭逢時，於活生生的日常場域中，殖民地台灣作為一個共同的認同元素被調度出場之際，雖然喚起了雙方某種跨時空共同體想像的情感，但實際上各自的國族認同所牽動的文化位階的劃分卻也隱然與之形成一股張力，在表面之下潛伏流動著，隨時因雙方互動的力場變化而呼之即出，角力一觸即發。在這樣的景況中，我們可以看見，殖民體制雖退場了，但其型塑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文化差異位階並未真正隨之解構，甚至與戰後以經濟力為劃分標準的新國際位階結合，突顯出遺留在台灣日語世代身心中的殖民傷痕。故而，也據此透顯出以殖民地經驗為介質的「跨時空共同體」的情感其實是極其脆弱的，因為那是建立在自身需求的懷舊想像與再詮釋之上的，一旦落實於實際互動中，種種殖民不平等的真實便會再度一一顯現，從而鬆動甚至瓦解此一共同體的想像與情感。

<sup>38</sup> 之所以謂之為「實際遭逢」主要著眼於與「論述性遭逢」的差異。

<sup>39</sup> 此一台日間殖民情結的錯綜複雜在林徐達的〈後殖民台灣的想像與文化身分操作〉一文中的「埔里 Long Stay 中村事件」亦有類似的狀況。詳參林徐達，〈後殖民台灣的想像與文化身分操作〉，《台灣的日本症候群》(台北：聯經出版社，2010年)，頁 120-124。

## 四、全球尺度下的後殖民遭逢

### (一) 殖民與被殖民位置的區辨與反思

中年之後的鈴木怜子曾多次造訪台灣。彼時的她一方面由於已然確知台日殖民史，從而感覺到了了解台灣這片土地歷史的義務與欲求。也因為如此，怜子懷著愧疚之心開始搜尋童年記憶中的「台灣人」，此時怜子在後見之明的殖民脈絡下意識到當年殖民地生活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認知到童年時所感受到的階級差異的根源是來自殖民體制，也從而在「國體」上界定了自我與他者，更因此看見了童年時未曾看見的事物——被剝奪母語的台灣人：日本天皇宣告戰敗後，「找回自己聲音」高聲歌唱的小男孩；想必會日語卻絕口不說的小女孩；被遵守國策的父親送往戰場的原住民青年等等。

除了重新審視日殖時期日人對於台灣土地、人民的剝奪以及殖民體制的平等之外。較為特別的是，曾經在台灣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鈴木怜子對於台灣戰後的民主運動也相當關注。這本原是在日出版的回憶錄當中，從二二八事件開啟長達 38 年戒嚴時期的這個脈絡來介紹台灣政治的百年追求，其中不僅提及了廖文毅、鄭南榕等民主志士，亦往前追溯了 1895 年馬關條約簽訂之後，台灣方面發表了亞洲地區最早的共和國宣言——「台灣民主國獨立宣言」，也不忘記錄原住民犧牲慘重的抗日霧社事件……在定位上，書中自始至終皆稱台灣為「國家」，甚至在參觀二二八紀念館時發出了這樣的感慨：「要是當時人民的反抗，能採取更有秩序的行動，或許今日的臺灣，可以成為一個人人讚頌其繁榮的獨立國家。如此錯過大好時機，至今仍令人握腕而嘆！」（《南風如歌》，頁 121）

鈴木怜子作為殖民帝國的一分子，因為具有殖民地台灣的生活經驗，甚至也與台灣人民一起經歷國府接收時期、二二八事件等歷史時刻，深刻而真實的看見了中國與台灣的差異，故而怜子並不似沒有殖民地經驗的（日本左派）知識分子那般，將帝國侵略的歉疚與贖罪的對象指向馬關條約締結前的宗主國——中國，而是將殖民者歉疚的眼光投射在被割讓、被殖民的台灣本身，視台

灣為主體，將台灣放進世界史的框架中思考，從而產生了「以台灣獨立為歷史正義」的立場。

與後帝國之眼相隨相生的，即是怜子赴美留學的經驗——怜子高中畢業後即赴美留學，因為歷史的機緣巧合遇上了「垮掉的一代」、馬丁路德·金恩倡導的人權運動。因此吸收了「反傳統文化」、「反種族主義」的精神養分，也使得怜子自認為嬉皮。而嬉皮的核心精神即為「愛與和平」，主張反（越）戰，提倡種族平等、性別平等、反璞歸真（自然）等。凡此種種精神養分都足以刺激怜子反思自己的童年經驗，也因為與台、日兩地拉開了距離，並脫離日本政府戰後刻意營造的戰敗受害者論述與被社會空間擠壓的灣生處境，而能更為客觀的檢視殖民地時期的台日關係，認清故鄉台灣其實是相對於祖國日本的「他者之地」。在此，文本中的自我與他者的劃分區辨產生了正面積極的意義——因為認清了身為殖民階層的歷史事實，了解到自己與日殖台灣的在地台灣人乃是不同的政治群體，從而催生了自我反省與批判，而不致落入「我們都是戰時／殖民受害者」的混淆與詭辯中。

## （二）日本人口政策的跨時代相遇

帶著上述的前提來閱讀《南風如歌》第三章——〈真想定居台灣〉，此一讓多數台灣社會大眾感動並認定灣生具有強烈「台灣認同」的篇章，我們就不會忘記當初台灣的日本移民村或是像怜子父親這樣因公派駐台灣的日本高階公務家庭之所以產生，很重要的推動因素是日本政府各項的獎勵政策使然。循此，我們就應該注意到老年怜子之所以萌發想定居台灣的念頭，其實並非表面上台灣媒體所渲染的單純的對台灣思鄉情切的情感動機<sup>40</sup>，我們不應忽略了其背後與日殖時期一般，其實亦有日本政府的人口政策作為重要的推力——特別針對老年人口推行海外「游牧享老」的政策。

<sup>40</sup> 在強調台灣是灣生的故鄉之時，往往遮蔽了「灣生歸國生活的時間早已遠遠超過他們在台灣成長的時日」此一事實。

根據其前述有關在台日人以及日本移殖民的研究，日本自明治初期起為了紓解人口壓力、解決經濟問題，開始注意到西方的移殖民論，並歷經眾多學者、官員的討論、修正而形成符合時代所需的日本國策。時至九〇年代，日本國內的人口過剩問題演變成人口老化的結構性問題。日本政府為了因應此一新時代的人口結構問題，一樣仿效西方，開始推動「游牧享老」的政策，成為亞洲第一個顛覆「生於斯養於斯」的傳統養老觀念，以政府的力量大力對外推廣輸出老人的國家。根據《商業週刊》的研究報導：

日本政府從一九九〇年代初期開始推廣銀髮族到海外游牧享老，除了協助民間推廣，更建立可以將退休金和養老金直接匯到海外帳戶的制度，並可以健保及醫療保險直接支付最高達 70% 的海外醫療支出，並與世界各國政府或民間業者談合作，在國外興建日本老人社區。<sup>41</sup>

凡此種種皆與日本帝國擴張時期的台灣日本移民村的建立有類似的政府力量的因素，而這卻也是台灣社會在看待灣生的台灣養老選擇時被有意無意忽略的重要政治經濟考量的現實面向。

日本的游牧享老政策之所以能夠推行，自然是建立在其強大的經濟優勢之上。日本雖為二戰的戰敗國，被遣返歸國後的怜子一家雖然過著與在台優渥處境落差甚大的生活，甚至後來自稱貧苦老人，其實仍具有（借錢）出國留學，爾後更有周遊列國的資本，如此的經濟優勢，其實突顯出了戰後日本作為一個經濟／文化強國的國際位階。作為強國的一分子，其國民也就繼承了母國的國際位階擁有了國際移動時的優勢位置，而獲得了充分的移動自由，擁有了更優勢的全球空間移動的實踐條件。怜子在國內的社會處境因為出了國境而有翻轉，出了國門之後，怜子在國內社會位階的差異不再，拿著日本護照就成了被打成鐵板一塊的日本人，一樣享受著國家的保護與優勢，讓怜子感覺到「能受到日本護照的保護是多麼幸福的事啊！」（《南風如歌》，頁 132）甚且說，「當我在國外，想到日本的所有友人，其生活水準往往高於任何一個我住過的國家，

<sup>41</sup> 賀桂芬撰（研究員：陳淨詒），〈退休不必焦慮 一年 50 萬過富翁生活〉，《商業周刊》第 983 期（2006.09.25—2006.10.01），頁 106-110。

再次讓我感受到日本國民水準之高以及其民族性之可貴。」(《南風如歌》，頁 133) 在此，民族國家在個體認同版圖的位置不但未被鬆動，反而更加的鞏固。但，此一固築是建立在經濟條件之上，所以民族國家在認同版圖的重要性雖強化了，性質內涵卻有很高的成分是經濟實用取向，此一功利取向也同時影響著跨國移動主體的其它選擇。這一點，我們也可在《南風如歌》中明顯的看見——在自述之所以捨棄原本情有獨鍾的墨西哥，而選擇台灣作為退休落腳地的理由時，伶子是這麼寫的：

基於個人因素，對居住墨西哥情有獨鍾。但透過和志明太太春桃姐閒聊之後，發現或許台灣才是最適合養老的地方。在台灣不會受到任何拘束，當我發現真實的自己時，還曾拍著桌子，放聲大笑。(《南風如歌》，頁 150)

在這段敘述當中，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伶子自述時常常出現因為生於、長於不拘小節的南國台灣所擁有的生活經驗而來的「因為我講話總是不太得體，在日本，對自己的人際關係並沒有自信。」(《南風如歌》，頁 156) 的文化不適應，在晚年與台灣友人的互動當中獲得解放。又如此對二女兒說：

在台灣，年長的人會說日語，年青人會說英語，語言上不成問題。台灣也是非常親日的國家。又是我出生的地方，對那兒的攤販食物也有免疫力，基本上沒甚麼問題。……同時我也想更進一步了解這個國家。同時，台灣的朋友也提到，在台灣用我的年金，租房子，過生活，都是綽綽有餘。(《南風如歌》，頁 153)

大女兒對此的反應是——「若是到台灣，我也贊同。本來擔心媽媽會去印度或墨西哥，因為到那麼遠的地方，據說連運送遺體，都會被航空公司大敲竹槓。」(《南風如歌》，頁 153) 至於為何選擇台北，並非因為是童年生活所在地，而是

因為臺北是大城市，身為亞洲面孔的我，在此不會顯得突兀，又可以同時接觸新興或傳統的各種文化。另外，近年來顯著發展的臺北，也受到

外國的注目，身在這個城市裡就可以掌握世界的脈動。（《南風如歌》，頁 154）

由上述段落讀來，老年的怜子選擇台灣當然包含了台灣為其「出生地」以及因為身上的殖民地文化碎片被丈夫笑稱是「一位不知道日本習俗的台灣人」所獲得的性格解放等因素。但綜合觀之，晚年怜子評量落腳地的重點更大的比例是十分實際的包含了語言、食物、健康以及更重要的經濟負擔等考量，而在選擇居住地區上更顯現了台北作為一個高度發展的國際都市對於怜子的吸引力。這樣以經濟發展為評量標準（但非唯一標準）的價值觀在書中其實不斷出現，尤其〈真想定居台灣〉一章中小至每日餐食、礁溪溫泉之旅，到房屋租金，外傭的顧用費……的金錢計算都一一換算成日圓。經由種種對於養老之地選擇理由的自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原本肇因於認同挫敗而展開的跨國移動，此時依附著「護照的強烈政治身分象徵」與「經濟價值觀的評量」將鈴木怜子的文化身分認同在繞了地球一圈後，更堅定的附著於祖國日本之上，並以之為傲。

從鈴木怜子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首先「游牧享老」作為一種選項，與帝國擴張時期的海外移民一樣是有日本國策時期在背後推動的，從此一角度看來，灣生選擇台灣作為落腳地，可視為兩個不同時代的日本人口政策的相遇。更進一步地檢視灣生怜子對於養老之地的選擇，更可以發現其透顯出來的是在浪漫的歸鄉情懷之外，對於一個舒適的、便利的、經濟可負擔的環境的追求。其中的舒適感當然有著灣生內在殖民地文化碎片所對應的「性格解放」，但更多的是將台灣放置在全球城市中的比較而帶給她的吸引。換言之，對於灣生怜子而言，首先是有日本政策的推行使得游牧養老成為一種選項，在此前提之下，選擇台灣作為養老的旅居之地，除了基於身上的殖民地文化碎片的某種認同驅使之外，更多的是現實經濟條件的考量。這是台灣社會面對灣生甚至是所有全球化移動議題時，應該更細緻地去思考與分辨的動機差異。



## 五、結論——互為他者亦互相生成

近年來在台灣引起廣大迴響的灣生議題，往往強調灣生們將台灣視為故鄉的私人情感之依戀，然而如此去政治化的觀點，畢竟無法充分理解灣生此一帶有強烈政治性的移民二代之特殊歷史處境下複雜的「家鄉／祖國」情感。就如同《南風如歌》的作者鈴木怜子所言：「即使對故鄉的台灣充滿著懷念，但另一方面，還有一個叫做「日本」的祖國保護著我。」（《南風如歌》，頁 132）台灣是故鄉，日本是祖國，祖國始終是存在的，而屬於灣生的故鄉台灣是一個停滯在日殖時期歷史點上的「凝結時空體」，台灣作為故鄉認同的身分元素被調度出場時，其必然是與日本作為國族認同相伴隨的，其所指涉的時空意義則僅止於日殖時期，並不向後延展。故而，在台日主體實際遭逢時，於活生生的戰後當代日常場域中，殖民地台灣作為一個共同的認同元素被調度出場之際，雖然喚起了雙方某種「跨時空想像共同體」的情感，但實際上各自的國族認同所牽動的文化位階的劃分卻也隱然與之形成一股張力，在表面之下潛伏流動著，隨時因雙方互動的力場變化而呼之即出，角力一觸即發。由此顯現出了台日跨時空想像共同體情感其實是極其不穩定的，因為那是建立在自身需求的懷舊想像與再詮釋之上的，一旦落實於實際互動中，種種殖民不平等的真實便會再度一一顯現，從而鬆動甚至瓦解此一共同體的想像與情感。

灣生的「故鄉台灣」已屬於過去，雖然過去，卻也在身上留下了殖民地文化碎片，型塑了某一部分的自我。灣生怜子因為跨國移動的頻繁，帶給她不同的精神養分與反思契機，讓她能清楚區辨故鄉台灣是相對於祖國日本的「他者之地」。在此，文本中的自我與他者的劃分區辨產生了正面積極的意義——因為認清了身為殖民階層的歷史事實，了解到自己與日殖台灣的在地台灣人乃是不同的政治群體，從而催生了自我反省與批判，不致落入「我們都是戰時／殖民受害者」的混淆與詭辯中，進一步結合其真實的殖民地經驗，促使其將殖民者歉疚的眼光投射在被割讓、被殖民的台灣本身而非割讓前的宗主國——中國，視台灣為主體，將台灣放進世界史的框架中思考，從而產生了「以台灣獨立為歷史正義」的立場。而灣生怜子選擇台灣作為養老之地，首先是有日本政策的

推行使得遊牧享老成為一種選項。在此前提之下，選擇台灣作為落腳地除了基於身上的殖民地文化碎片的情感驅使之外，更多的是身為經濟優勢的日本國民所作的現實經濟條件的考量。這是台灣社會面對灣生甚至是所有全球化移動議題時，應該更細緻地去思考與分辨的動機差異。唯有如此，台灣方能在此後殖民時空中，一步步邁向精神解殖，真切地描繪自我歷史圖象、建構台灣主體性。

## 參考資料

### 一、專書：

- 下山一（林光明）自述，下山操子（林香蘭）譯寫《流轉家族：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台北：遠流出版社，2011年）。
- 田中實加，《灣生回家》（台北：遠流出版社，2014年）。
- 竹中信子著，蔡龍保譯，《日治台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明治篇 1895-1911）》（台北：時報文化，2007年）。
- 邱函妮，《灣生風土·立石鐵臣》（台北：雄獅，2004年）。
- 鈴木怜子著，邱慎譯，《南風如歌——一位日本阿嬤的台灣鄉愁》（台北：蔚藍文化，2014年）。
- 張素玢，《未竟的殖民：日本在臺移民村》，（新北：衛城出版社，2017年）。
-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台北：麥田出版社，2012年）。
- 李育霖，《翻譯域境：主體、倫理、美學》（台北：書林出版社，2008年）。
- 戴寶村編，《台灣歷史的鏡與窗》（台北：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2012年）。
- 所澤潤、林初梅主編，林初梅監譯，《戰後台灣的日本記憶》，（台北：允晨文化，2017年）。
- 《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2003年）。
- 若林正丈、松永正義、薛化元主編，《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論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8年）。
-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2016年）。
- 王政、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 思想編輯委員會編著，《台灣的日本症候群》（《思想》期刊第14期），（台北：聯經出版社，2010年）。

## 二、論文

### (一) 期刊論文

林慧君，〈日據時期在臺日人小說中灣生的認同歷程〉，《國文天地》25卷3期，  
(2009年8月)，頁56-61。

——，〈新垣宏一小說中的台灣人形象〉，《臺灣文學學報》第16期，(2010  
年6月)，頁85-111。

陳翠蓮，〈去殖民與再殖民的對抗：以一九四六年「臺人奴化」論戰為焦點〉，《台  
灣史研究》9卷2期(2002年12月)，頁145-201。

曾秀萍，〈一則弔詭的臺灣寓言——風前塵埃的灣生書寫、敘事策略與日本情  
結〉，《台灣文學學報》第26期(2005年6月)，頁153-189。

——，〈灣生·怪胎·國族—《惑鄉之人》的男男情欲與台日情結〉，《臺灣文  
學研究學報》第24期(2017年4月)，頁111-143。

### (二) 學位論文

張素玢，《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9-1945)：以官營移民為中心》(台北：國  
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

鳳氣至純平，《中山侑研究—分析他的灣生身分及其文化活動》(台南：國立成  
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的台灣歷史像〉(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年)。

## 三、雜誌文章

賀桂芬(研究員：陳埤詒)，〈退休不必焦慮 一年50萬過富翁生活〉，《商業周  
刊》第983期(2006.09.25—2006.10.01)，頁106-110。

#### 四、影音資料

黃銘正執導，《灣生回家》（台北：田澤文化，2015年）。

